



“几辈子的苦在我这都结束了”

再苦这一个夏：贫困夫妻告别大山记

“这是王玉云一家在山里的最后一次收豌豆。收完，他将告别大山，告别那些爬不完的沟沟坎坎，开始新的生活”

本报记者姜伟超、聂建江

凌晨两点，52岁的王玉云和妻子点亮了灯。老母亲还在炕上睡着，夫妻俩简单吃了一碗豆奶粉泡馍后，拿上镰刀、水壶、磨刀石，戴上头灯，下地了。他们没有过多的话，四周也没有声音，只有两盏头灯的亮光高低不停地沿着山路远去。此时，离他们前一天晚上睡下不到5个小时。

王玉云一家世代居住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古丰乡王府沟村，地处六盘山区，村子因传说不知哪个朝代有一位王爷曾来此避难而得名。从上往下看，一条条沟壑，把山坡分割成七零八碎的条块。一条主沟的上下两岸，都统进好几条大大小小的支沟。远远望去，恰如一个老汉赤裸胸脯上的暴突筋络。

山上没有路，人踩出来的路经过雨水冲刷，像牛背一样难以落脚。走到离村子最近的一块豌豆地里，王玉云和妻子扎紧裤脚，拿起镰刀，两盏头灯，照出了两块灶台大小的光亮，在无尽的大山里缓慢移动。今年豌豆受旱，细弱得像猴毛，产量也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一。王玉云家全部收成打满算只有1万元。

王玉云和妻子半蹲着行进，先把割下的豌豆就手堆成一小堆，再码成圆形的大堆。两个小时过去，凌晨4点了，温度逼近零摄氏度，连虫子都已经睡去，周围是巨大的安静。往四周看去，黑黢黢的山梁比黑夜更黑，将这片天地牢牢围住。头灯照出的光越发昏黄，镰刀也钝了。玉云的妻子拿出磨刀石，开始磨镰刀。

大山的雄奇壮丽是送给游人的，留给山民的永远是爬不完的沟坎、吃不完的窖水。王府沟村近500户靠种植箭舌豌豆和小麦、洋芋生活，贫困发生率近50%。王玉云家的50亩地淹没在一条条山梁的深处，被山梁切割成100多“块”，成熟的



▲王玉云（左）和妻子徐秋林靠着矿灯的光亮，沿着山路前往地里收庄稼。

豌豆遇到暴雨天，豆荚就会在地里炸开，夏收对山里人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争，这个过程少则几十天，多则几个月。遇到地气凉的年景，庄稼成熟晚，经常开始下雪后，山里人还在冒着雪夏收。

镰刀这种原始农具，王府沟村的人才用了10年左右，以前的庄稼都是用手拔。几十亩庄稼拔完，双手长时间不敢紧握。王玉云说不是不知道有镰刀这种收割工具，但这里的人惯性地认为山里的地松软，拔起来不费力，用上镰刀后才知道，割比拔好。

趁着妻子磨镰刀的功夫，王玉云把堆成圆堆庄稼抱在一起，方便天亮后用三轮车运下山。满载的三轮车在山梁上行驶，靠的不仅仅是磨炼出来的驾驶技术，还有运气。随着车子的颠簸和跳动，驾驶人的身体需要不断做出相应的歪斜，用尽全身力气掌控车子。遇到上坡，车子冲不上去会突然失控下滑，猛踩刹车也不管用，只能等车

子滑停后再换挡继续爬。

山路是王玉云一辈子的心病。父亲是得贵门瘸去世的。第一次去医院时正碰上下雨车进不来，几个小伙子用一张旧床把老父亲抬下山。老人受不了上下山的折腾，最后即便在炕上疼得翻滚、半个月水米难进也坚决不肯就医，在山里慢慢耗尽了生命。

2013年春节后，眼看上大学的儿子就要开学，却下起大雪，“羊都下不了山”。心急如焚的王玉云和儿子扛起箱子，从家门口就开始摔跤，用了两个小时“摔”到了山下。

凌晨5点多，大山仿佛打开了一丝缝隙，一道晨光透了进来，王玉云和妻子关了头灯，坐在一条蛇皮袋子上稍作休息。妻子摘下包住头脸的围巾，捋了捋被汗水粘住的头发，解开包着馍馍的塑料袋，把馍馍掰成碎块，放到一只搪瓷缸子里，再把热水瓶里的开水倒进去。

王玉云吃了几口，直起身捶了一下僵硬的腰。刚挪了几步，不想一脚踩空，等跟着站住，已经到了别人地里。王玉云上跨来狠狠踩了踩脚。

“什么时候能搬到山下，有块平地盖座房子，不用大，容得下两铺炕就行。”“离开大山”这个话题年轻时王玉云就开始和村子里的同龄人琢磨，但直到成家有了孩子，大家还生活在山上。山地的收成糊不住一家人的日子，王玉云开始下山打工，到过县城、去过新疆。但不管走多远，家都在山上拴着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玉云和同龄人讨论怎样“离开大山”的次数越来越少。不知什么时候起，大家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只是日复一日踏着山里的沟沟坎坎。

天越来越亮，淡白色的氤氲弥漫在远处的沟坎间，由远及近渐渐浓厚。

对王玉云来说，梦想不是逐渐实现的，而是

在一瞬间实现的。2013年，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承诺，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奔向小康的路上，一个百姓也不能少。根据“十三五”规划，自2016年至2020年，约1000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大山，远离恶劣的自然环境。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高深山区贫困群众脱贫—返贫—脱贫“转圈圈”问题，甘肃省、武威市及王玉云所在的古浪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启动，王玉云和全村人的命运被推到了一条风景更加美丽的轨道上。

2015年的一天，乡上包村干部来到王玉云家，开口就问“愿意搬下去不？”“什么？”王玉云反问了一句。梦得太久，临到实现的那一刻反而迟疑了。“县上规划搬迁，什么都想到了，也都准备好了。”乡干部回答。搬迁下去面对的是未知的生活，但乡干部只用两个关键词就坚定了王玉云的想法：有水、是平地。

2014年，甘肃省武威市及古浪县实施了生态移民扶贫开发黄花滩移民搬迁工程项目，开发了8.62万亩土地，布局安置搬迁高海拔山区4万贫困人口移民搬迁。移民区同步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同步发展设施农牧业和特色林果业，使山区农民通过易地搬迁，一步到位发展现代设施农牧业，实现易地脱贫致富，斩断穷根。

王玉云上妻子来到移民区。房子框架已经盖好，王玉云选好户型，2016年就领了一栋独院的房子，外带一座养殖暖棚和整块的5亩水浇地。整套房子王玉云只掏了1万多元，自己又装修了一下，窗明几净，怎么看都不比城里人住的差。“睡在山上40多年的土房里不踏实，就怕房子突然塌了；睡在新房里也不踏实，老以为在别人家里哩。”王玉云想起来就嘿嘿笑。

转眼间，红彤彤的太阳刺破云朵，升起在碧蓝的天空。气温开始上升，一股股热烘烘的暖意从山坡上流动着，夏虫和鸟儿的叫声此起彼伏，愈来愈密，金光闪闪的坡坎似乎在夏虫动人的歌唱中抖动起来了。

这是王玉云在山里的最后一次收豌豆。收完，他将告别大山，告别那些爬不完的沟沟坎坎，开始新的生活。王玉云说，山下可以养70只羊的养殖暖棚已经整修完毕，他已经盘算好，妻子在家养殖、种地，自己有建筑手艺，在工地打工一天能挣两百多元。更重要的是再也不用半夜起来夏收了。

王玉云不知道祖上为什么走进深山，但他知道是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斗争将他一家领了出来。“再在山上干一个月，几辈子的苦在我这都结束了。”王玉云说。

当地政府已经启动王府沟村搬迁后所有土地的封山还草，恢复生态工作。可以预见，若干年后王府沟村将和这片大山彻底融为一体，人们只能通过一些依稀的痕迹来感悟这沧桑巨变。但不管是王府沟村还是王玉云，都将成为我国反贫困斗争的一个侧面，并将和我国奔向小康的7.7亿贫困人口一起，化为脱贫攻坚的丰碑。

本报记者袁全、王飞

在距离天安门不到5公里的西二环，有座高180米的大烟囱，虽废弃多年，但关于它存废的争论延续至今。按最新披露的改造方案，它或被改成8米高的观光平台，从此“泯然众楼”。

烟囱改造项目的负责人王武表示，最新中标方案来自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团队，已在7月递交城市规划部门。一旦获批，就准备开工。

“压倒性破坏”

大烟囱位于北京西二环莲花池东路，中国华电集团下属的北京第二热电厂厂区内。为减少空气污染，热电厂已于2009年关闭并搬迁至郊外。2016年，旧厂房被开发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赞成拆除的专家认为烟囱“站错了位置”，破坏了周围的文物历史风貌和首都中心城区的天际线。

与大烟囱相距不足百米就是有898年历史的天主教堂。塔高57.8米，建于近代，位于天主堂内。寺庙毁于元末战乱，后于明朝重建。寺院以古塔和菊花闻名，每年吸引众多信徒和游客拜访。

改造计划的首席设计师霍春龙认为，烟囱的高度比天主教堂超出3倍还要多，“非常不尊重周边的文物”。

“按照现在的文物保护法，距离文物建筑一公里范围内都不得有过高的设施，更不用说是在100米之内了。”

文物不能独善其身，它与周围环境是一个整体。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划定了天主堂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筑控制地带。按要求，烟囱和厂房所在的区域内建筑高度不得超过30米。文物保护法也明文规定：“对破坏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必要时应予以拆迁。”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姚远认为，影响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随着经济转型发展失去了原有功能，退出了历史舞台。拆除是贯彻文物保护法的体现，也为恢复文

首都烟囱存废史

“它们曾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标志，又日渐沦为工业遗产。它们到底是北京文物保护中的一个败笔？还是我们的警示柱？”

物周边的历史风貌提供新机遇。

九三学社北京市原城建环保委主任杨振华说，“天主教堂是重要的历史遗产，但热电厂是在文革期间修建，当时人们对文物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强。”

建于1976年的北京第二热电厂，曾为北京前三门大街地区多家重点单位供电供热，其中包括南海和人大大会堂。为减少损耗，就近选址西便门天主堂附近。

“当时这一带居民较少，搬迁成本低，就是一片荒芜的玉米地。”参与工厂建设的副总工程师，60岁的申兰海告诉记者，文物可能是当时建厂唯一没有考虑的因素。

工业遗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林立的大烟囱曾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标志。北京也长期作为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从天安门望出去，应该处处都有烟囱”。上世纪80年代，北京城区就有大大小小1.4万多个工业烟囱可见，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直到1983年，中央政府要求北京建设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不再发展重工业”。



▲北京第二热电厂鸟瞰图。

图片由王武提供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烟囱应该保留，作为北京发展的历史见证。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中枢认为，烟囱和古塔已共存40年，互不排斥，两座建筑一起成为新的历史遗迹。

“我们对建筑遗产的认识也是不断演进和丰富的。如果在景观上做一些改善，我认为烟囱不用拆除。”赵中枢说。

但并不是所有专家都认同烟囱的“工业遗产”身份。北京地理学会副会长朱祖希认为，烟囱只有40年历史，且并无特殊价值，对天主教堂是“百害而无一利”。

“它只能说是北京文物保护中的一个败笔，也是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一大败笔。40年过去了，天主教堂的噩梦该结束了。”

43岁的陈滢在热电厂工作了20年。她说，这是北京第一家配备燃油锅炉的热电厂，不仅高效，而且在当时也是最环保的。“烟囱被建造得如此之高，就是为了烟尘飘远，减少污染。”

在她眼中，这座烟囱不仅保存了城市记忆，也记录了她的青春。

每年冬天，她和同事每隔两小时就要爬到36米高的锅炉房检查机器。虽然辛苦，但她却很

自豪，因为自己的工作保证了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光明。

“这是北京城区被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工业烟囱。为什么不能留下一个烟囱来纪念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陈滢说。

事实上，很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筑物都因废弃而难逃被拆除的命运。北京儿童医院被业界誉为是新中国现代建筑的优秀范本，其35米高的烟囱设计最为巧妙——里层是烟囱，外面装饰为水塔。2005年医院欲将其拆除，后多位建筑专家挺身而出，希望保留，但最终还是在2008年奥运会前拆除。

曾坐落于中关村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被称为是共和国科学第一楼，见证中国高科技的起步和发展，走出一批科学家、工程院院士。但最终也因空间、成本问题而放弃改造和迁移方案，于2016年被拆除。

位于北京东五环的焦化厂曾拥有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炼焦炉，服务于几十万北京居民和上千个机关单位。2006年停产，其厂房入选《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并计划改造为大型工业遗址公园。但去年有专家发现，6根本应“强制保留”的大烟囱只剩下2根。

一家微信公号在去年3月组织在线投票显示，700多名参与网友中有超过60%的人认为烟囱应该被保留。

新用途

“所以，我们认为将其拆除到8米高的改造方案，是让烟囱焕发了新生——既让大家记住这段辉煌的工业历史，也保护了天主堂以及距离更远的白云观。”霍春龙说。

专家们的争议，让决策者想到征集民间智慧。2016年3月，热电厂和西城区政府组织了一次大烟囱改造方案的征集活动，“希望在保留烟囱原貌和历史痕迹，在不破坏烟囱本身结构的前提下，设计开发烟囱全新的功能和用途，将其打造成地标性建筑。”两个月内共收集到51个设计方案。参与者最年长的86岁，最年轻的是中学生。

令王武印象深刻的一个方案，是在烟囱顶部悬挂一面巨大的LED屏，用来播放公益广告或实时空气质量。

“这个既引人注目，又环保，而且造价不高。”王武说。

陈滢希望改造后的烟囱能够“轻松、活泼”，“少一点工业化”，毕竟工厂周边的文化娱乐设施太少。她曾和同事开玩笑，建议烟囱上搭建平台开发跳伞或者蹦极项目。

尽管北京规划部门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但关于烟囱去留的问题已出现在西城区初中地理毕业会考的试卷上。没有标准答案，合理即得分。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马英认为，烟囱去留的争议，是文物保护进步的表现，也显示了决策者对城市建设更加谨慎的态度。“城市规划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还需要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建言”。

他还举例巴黎蒙纳斯大楼，这座超过200米高的建筑在1973年竣工后，因对巴黎的天际线构成了极大破坏而备受诟病，但却作为“反面教材”，一直保留至今。

“我们为不留下一座烟囱，让争论持续，去警示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呢？”马英说。